

深耕经典 礼敬先贤

——评李嘉翼、祝鸿杰《尔雅正义》点校本

■周文兴



《尔雅正义》
(清)邵晋涵著
李嘉翼 祝鸿杰点校
中华书局出版

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阐释,要从基础工程扎实做起。传统经典的整理是最基础的工作,而字词工具书的点校更是基础中的基础。但是多年来,这种最基础的工作由于难度大和效益差,只有极少数学者甘愿扶犁以进。以清代著名学者邵晋涵(1743—1796)的代表作《尔雅正义》为例,这部梁启超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强调“应该特笔记载”的名著,中国古代首部词典,从1982年到现在,整整七个五年计划的时间,除了武汉大学李格非先生曾准备着手点校整理外(李格老过世后就没人愿意做下去),一直处在“无人问津”的状态。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。

前不久,李嘉翼、祝鸿杰二位先生点校的《尔雅正义》由中华书局正式推出,让我们看到:学术界仍然有不计名利、不计报酬、甘于奉献的耕耘者!文化界仍然有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的助推者!读书界仍然有深入挖掘人文经典宝藏、展现中华文化永久魅力的开拓者!

《尔雅》收录词汇4000多个,按类分为释诂、释言、释训、释亲、释宫、释器、释乐、释天、释地、释丘、释山、释水、释草、释木、释虫、释鱼、释鸟、释兽、释畜19篇。《尔雅正义》是清代注释《尔雅》的重要著作之一,作者邵晋涵用力数十年,于乾隆戊申年(1788)初刻,次年(己酉)重校定稿。这部著作广采汉晋诸家训诂与郭(璞)注比较,相同的会通其说,相异的博其旨趣,并对郭注谨慎阙如之处进行补注。

引经证注,辗转旁通,稽考声韵,辨别名物,并随文发明经注体例,构建了清人注疏《尔雅》的基本框架,开创了雅学研究的新局面,开启了清人重新注疏十三经的先声。

李嘉翼先生是训诂学的行家,对《尔雅》情有独钟,用力甚勤,已发表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十多篇。李嘉翼先生不仅深谙点校之道,更深怀实事求是的学术追求。《尔雅正义》点校本以己酉重校本为底本,通校戊申初刻本,用校勘记全面反映邵晋涵的修订成果,《正义》成书、定本的经过与思路得到清晰地呈现。点校本对邵著做

了准确细致的标点、校勘、分段,附录大量有关邵晋涵和《尔雅正义》资料,丰富而详实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李、祝点校本制作了深度的索引,不止将《尔雅》《尔雅注》涉及的字词编入索引,还将邵晋涵在《尔雅正义》中指出的某字通作某,本或作某,别书作某,省作某,古字作某,误作某,等等,均编入索引,并括注《尔雅》本文之字,略翻索引,即可大略了解邵晋涵的语言文字思想,极便学者研读利用。

据李嘉翼先生介绍,他从2006年开始着手整理《尔雅正

义》,2012年底与中华书局签订合同,按协议2013年底出书,为给人们提供一个经得起检验的本子,前后进行了四校,出版因而推迟了四年,加上前期的准备工作,点校整理的时间与邵晋涵撰著的时间相当。李嘉翼先生说,是邵晋涵的人格鼓舞他坚持下去的。原印影本繁体字、生僻字计50多万,字迹漫漶,一般的打字店不敢揽这活,是他妹妹的鼎力帮助才最终完成书稿。新时代,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,非常需要这种“十年磨一剑”的精神!

李嘉翼先生认为,对传统文化中的经典,必须秉持客观、科学、礼敬的态度,取其精华,去其糟粕,扬弃继承,转化创新,不复古泥古,不简单否定。《尔雅正义》的点校整理,耗时最多的是对邵著错误的修正。邵著虽为名著,但校勘补正,不尽中肯,漏校误校,时时有之。对此,点校者均一一进行了订正。如《释言》“迨,及也”条,邵著:“下文‘逮,及也’,‘迨’,或体字也。《小雅·伐木》云:‘迨我暇矣。’”今按“迨”,古音在定母之部;“逮”,古音在定母月部。《尔雅郝疏刊误》:“念孙案:‘迨’与‘逮’义同而声异,不得混为一字。此非精于三代两汉

之音者固不能辨之。”邵氏以异字为同字,误。又如《释水》“澗,沙出”条,《正义》引郭注“今江中呼水中沙堆为澗”,邵著尽管引《类篇》云“江东呼水中沙堆为澗”,然未明确指出“江中”应为“江东”之误,“澗”字下尚脱“音但”二字。阮元《校勘记》云:“雪牘本同。注疏本‘江东’改‘河中’,又删下二字。按《一切经音义》卷十、卷十一、卷十九三引此注皆作‘江东’。”按阮说,邵氏显然沿袭注疏本之误,而未注意雪牘本与唐写本所引郭注,以致漏校。李嘉翼先生在点校时还纠正了邵氏的牵强附会甚至错误之处。举例说明,邵著《释言》“萎,昵,亟也”条,郭注“亲昵者亦数,亟亦数也”,“亟”是个多义词,“萎”为“屡次”之亟;“昵”本作“昵”,训“亲昵”之亟,“屡次”与“亲昵”义不同,邵疏“亲昵亦数也”,牵合郭注,实不可取。李嘉翼先生对邵氏援引书证但例不证词问题也不放过,如《释诂》“扬,续也”条,邵著引《曾子立事》篇:“身言之,后人扬之。”句中“扬”为“称道”“称颂”,非谓“继续”,邵氏引例不当。又“越,扬也”条,邵著引《周语》云:“汨越九原。”韦《注》云:“越,扬也。”按“越”当训“治”,邵氏对韦注之误未能辨正,引用不当。凡此种种都体现了点校者严谨求实的精神。

李嘉翼、祝鸿杰二位先生,甘坐冷板凳,誓啃硬骨头,用力12年,给我们贡献了一部精品。这种默默耕耘、矢志不渝的奉献精神,是我们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过程中应该大力弘扬的。

守望中国文化之拳拳赤子

——读陈福康《郑振铎传》《郑振铎论》

■胡晓明

今年是郑振铎先生120周年诞辰,去世60周年。一个甲子,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,代表时间之流逝、厚积、循环、纪念。而陈福康教授于此际修订再版《郑振铎研究书系》(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)三种——《郑振铎年谱》《郑振铎传》《郑振铎论》,意义重大。陈福康教授是学界研究郑振铎当之无愧的第一人,自上世纪80年代起即笔耕不辍,立志为郑先生著书立传。数十年间,他以一人之力,通过长期扎实而艰苦的学术钻研,勾稽史料,推陈出新,建立了关于郑振铎研究的年谱、传记、论述之完整系统。今年发表的这一系列重要成果,标志着当代学者对五四学人史研究达到了新的水平,具有学术典范的意义。

首先,重新认识郑振铎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地位与意义。通过陈福康教授的执着钻研,其所发掘援引的大量思想动因、具体事例及人物关系,令人真正了解到:郑振铎实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之先声与翘楚,他是真正求中国文化能独立世界学林之五四新学人,是汲汲热衷于保卫和启迪文明火种的传火者,是尽心传承华夏文化之拳拳赤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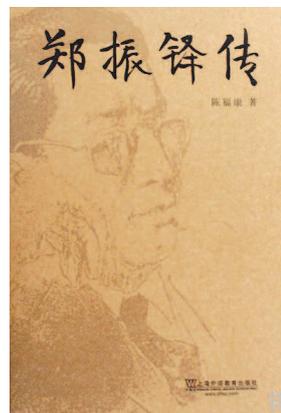
郑振铎是五四新文学运动背景下诞生的、开时代风气的新学人。他和诸多同时学人不同,童年较少深厚的传统家学之熏陶,却能不受五四时期偏激绝对的反传统思潮影响,主动吸收传统文化母体之精髓养料,又以崭新而客观的视角洞察历史,谋划未

来,以求中国文化之真、通、新。1920年,以郑先生为核心组织的民国第一个且最大的新文学社团——“文学研究会”之会章即表明:“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,整理中国旧文学,创造新文学为宗旨。”他对传统文学和文化的认识、发掘、整理,是要求其真、执其正,辨清“金玉”与“沙石”。在此基础上,他有《中国文学史》(中世卷第三篇上)、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《中国俗文学史》等著述,同时也在文献、艺术、考古、民俗等方面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,是为求其“真”。同时,他又不仅将中国文化从古至今联系起来,还“在与世界文化的广泛的比较和研究中,阐述新的文学观念”,大量翻译引进世界各国文学,发比较文学之先声,是为求其“通”。最后,他也大力主张五四新文学之蓬勃发展,不仅自己投身于散文诗、小说、杂文等创作之中,还大力组织文学社团,创办编辑文学刊物,是为求其“新”。正因时代与个人所带来的“雄浑精神与广阔视野”(卢卡契语),以及对中国文学文化深沉的热爱,郑振铎才能有如此深刻伟大的认识与贡献。

同时,郑振铎是具有使命感、启引中国文明火种的传火者。首先他以积极而负责的学术态度,针对传统文学遗产做了大量成系统的编选、题跋、校勘、出版等工作。如其主编《世界文库》时,就亲自整理保存了诸多重要诗集版本,包括敦煌文献;对小说、

戏曲、民间文学的刊载也不遗余力;足见其对待文化遗产鞠躬尽瘁、薪尽火传之责任心。其次,在抗日战争时期,郑振铎在形如孤岛、危如累卵之上海极力抢救、影印、收购文学及文化遗产,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财富。郑先生认为:“‘辑佚’的工作,往往是‘文艺复兴’的先驱。”陈福康教授评论郑振铎:“努力整理中外文学遗产,以夸父与日逐走和普罗米修斯盗取神火的大圣大勇精神,在昏暗的旧中国的文坛上点燃了耀眼的篝火!”期待中国文明之复兴重立世界文明之林,正是其使命与责任所系。最后,郑先生之热望又非无本之木,而是根源于对世界文明的宏观理解,以及对文学之大用的强调。他坚持现实主义的文学观,“为人生”的文学,以复兴、发扬中国之文学文化为己任,并强调文学之于社会人生的巨大影响;他也不断积极发掘提拔新文学作家,如郁达夫、许地山、黄庐隐,甚至老舍、巴金等,并倡导儿童文学的创作发展,可以说充满对未来文明之曙光的乐观期盼。

此外,郑振铎对中国文化命运的捍卫与赤诚,亦足见其拳拳赤子心。他是学者、作家、编辑,也是以笔为剑的旗手和斗士。陈福康教授给出这样的评价:“郑振铎的一生,就是这样追求光明,追求革命,一直保持前倾姿势的一生。”同时,上海作为郑振铎一生中重要的因缘之地,也见证了其抗争与转变的人生轨迹。在上海的五卅运动、“四·一二”反



《郑振铎传》
陈福康著
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

动政变、日本侵华战争的孤岛时期、战后的民主斗争中,他都能看清中国未来的道路并坚定地站在进步的一方;并以文化人所能竭尽的一切努力,不惜冒着生命危险,以“殉道者”般的进步思想和实际行动捍卫中国的光明与希望。到新中国成立之后,郑振铎身居文化系统要职,鞠躬尽瘁、勤恳为公,受到政界、学人的一致推重;1958年先生的壮烈牺牲,则令当时文化界万分震惊与惋惜。

陈福康教授关于郑振铎的著述,特以穷尽史料、故事细节及人物之相互关系为重要特色。如《郑振铎传》中有抗日时期郑先生著名的“最后一课”,还有本次修订新增的在四马路与汉奸“赛跑”等见诸报端的大量珍贵史料。《郑振铎论》中则新增了“郑振铎与同时代人”这一系列专题,使得先生与时人的交往、时代与个人的际会沉浮历历在目,这也是作者多年心血所成。读其传,如见其人;这些人生中宝贵的故事与细节,使我们能更加深刻地体会郑先生捍卫光明与文化的赤诚之心。一生奋斗不息的郑先生正是这样一个文化人的典范楷模,也是守望中国文化之拳拳赤子。